

蒋勋 | “生活美学”传道者

近几年,台湾作家、艺术家蒋勋颇受瞩目,他的《孤独六讲》《生活十讲》等书广受好评,最近又推出了新作《少年台湾》。他解析《红楼梦》《清明上河图》也是受众颇多。其原因,是因为蒋勋谈的是美学,也是生活。“生活美学”加上天生的好嗓子,让蒋勋成了最流行的美学大师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资料

蒋勋大学念的是史学系。受诗人痖弦影响,他原想投身戏剧领域,可当时台湾戏剧界的流行观念与他格格不入,只好忍痛转向。在改投美术系、哲学系遭家人反对后,蒋勋进入了“中国文化大学”史学系。

“以往我对文艺的爱好是主观的,但经过史学训练后,我开始把文学艺术摆回其所在的时代背景、社会环境中,而不再停留在少年时期那种浪漫的主观判断上。”蒋勋说,历史学背景让他得以从“主观感性艺术”走向“知性客观的艺术史研究”。读他的《写给大家的西方美术史》《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》《美的沉思:中国艺术思想论》等书,听他讲解《寒食帖》《清明上河图》,皆能窥出史学的门径。

但为什么将史学方法运用于探究艺术,而不是单纯的研究历史?因为那些血腥残酷的历史事件令敏感的蒋勋倍感恐惧,“权力争夺真是好可怕。”唯有艺术,才能抚慰和提升人性。他举例说,明亡后石涛、八大山人等优秀人物都走上了艺术道路,是想获得超越于政治之上的价值观。“当前朝的仇恨消失,我们才发现,他们在艺术上营造了崭新的视觉空间,为后人理解当时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线索。”所以,艺术才是永恒的。

随后,蒋勋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艺术研究所读了两年,在名师指点下,钻研历代文物。为他日后讲先秦、讲唐诗、讲宋词、讲红楼,奠定了国学根基。

1974年蒋勋赴巴黎留学,严格的美学训练、广泛的美学实践使他迅速成长起来,尤其对“还原法”情有独钟。所谓还原法,指将艺术作品还原为作者的风格,再进一步还原到作者所处时代的风格,最后还原出当时的社会环境、现象。这对蒋勋影响深远,基本构成了他的美学探索的路径。

西方“异文化”也提供了反照中华文化的资源。游历欧洲的时候蒋勋发现,欧洲人强调独立,年轻人敢满世界地闯,活得自我、潇洒。相反,华人总爱挤作一团,每个人都很委屈,“是不是中华文化已经老了,失去了动力和勇气?”他自问。追问数十年的结果是写出了《孤独六讲》《天地有大美》等。

留学回来后蒋勋被纳入学院体制,讲课、研究、发论文,履历在逐步升高。有一天,他却辞职了,“生命一旦稳定就没有危机感,生活就没有活力。”另一方面,蒋勋觉得大学里的高头讲章离普通人太远,离生活太远,“而远离了日常生活,美又在哪里呢?”

从1980年代起,蒋勋在新竹科技园区的IC之音开课,主讲“美的沉思”。起初除了“小猫两三只”,乏人问津。但渐渐有了人气。蒋勋勾勒出的听众形象是:“名校毕业生,三十七八岁,企业骨干,有期权、股票分红,很多年没休假,一直熬到过劳死。”刚开始他们是很功利的,一上来就问:“我女儿五岁,学钢琴好还是学小提琴好?”蒋勋答:“你先不要管钢琴还是小提琴,你可不可以每天抱抱她,让她感受父亲的体温?”

这其实就是蒋勋提倡的“生活美学”——通过生活的细节领悟美、感受美。

由于讲得好,讲得入心,名气越来越大,林青霞说蒋勋是她的“半颗安眠药”。豪门贵妇也结伴来到“红楼梦私塾”。讲到贾琏在外包养尤三姐时,蒋勋注意到,她们是有感触的。

更多时候蒋勋是讲给普通人听,特别是讲给年轻人听。凡有华人的地方他都愿意去讲一讲,并管自己叫“美学传道者”。蒋勋觉得,中国人活得太累、太委屈,如果能从生活中发现美、从美中发现自我,境遇就会好得多。



▶ 蒋勋

1947年生于西安,祖籍福建长乐,成长于台湾。“中国文化大学”史学系、艺术研究所毕业,后赴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。曾任《雄狮美术》月刊主编,先后执教于中国文化大学、台湾大学等,现任《联合文学》社长。著有诗作、小说、散文、艺术评论等,代表作有《孤独六讲》《生活十讲》《天地有大美》《汉字书法之美》等。

谈孤独:懂得孤独,才有自我

生活周刊:您最打动我的一本书是《孤独六讲》,您逐个分析了情欲孤独、思维孤独、语言孤独、伦理孤独等等,您很小就感受到了孤独?

蒋勋:是。十三四岁开始发育,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只是觉得身体里有东西在骚动,可难以启齿,不敢跟爸爸妈妈讲,不敢告诉老师,很恐慌,自己偷偷地探索,觉得特别孤独。很偶然的,我读到了《红楼梦》,当我看到贾宝玉也有性幻想,有梦遗,吓了一跳!曹雪芹告诉我,贾宝玉13岁了,你也13岁了,发生这些事情是不意外的。《红楼梦》的及时出现对我是一种救赎,让我知道了如何面对、处理自己的孤独。

生活周刊:这种孤独不仅仅来自于童年经验吧,您还出版了《因为孤独的缘故》《苍凉的独白书写》等书,包括新作《少年台湾》,都在反复申诉着孤独。您也谈到过,我们的氛围会让人的孤独感更强烈。

蒋勋:是。在汉字里“孤”和“独”都不是好字,失去父母照顾的小孩叫孤儿,没有小孩照顾的父母叫独居老人。我们非常怕孤独,所以你一生都没有独立的自我,你永远处在各种人际关系里——你是爸爸妈妈的儿子、女儿,你是丈夫的妻子或妻子的丈夫,你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……你的自我系于他人身上。

这样就能逃避孤独了吗?不是的。有自我才能对话,即便身处沙漠,你还可以跟星空,跟狐狸、黄羊对话。但你没有自我,就算生活在城市当中,人

跟别人也是不对话的,甚至害怕别人。华人那么爱热闹,就是缺乏安全感,太孤独。

生活周刊:您认为这与传统文化有关,在这方面,您一直批评儒家。

蒋勋:非常批评。儒家文化有了了不起的地方,但对私生活太严厉,阻碍年轻人发展独立的自我。我小时候在房间里看书,大概每过十分钟,妈妈就会来看一看我在干什么。我发现我的学生,问他任何问题都很犹疑,最好回家先问问爸爸妈妈。我很奇怪,你都20岁了,没有自己的主张吗?父母是爱你,可最后却以爱你的名义使你失去自我。

生活周刊:所以大陆有网友组建了“父母皆祸害”小组,您怎么看?

蒋勋:我当然不认为父母是祸害,可是整个华人世界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,那就是家庭太保护孩子了,把少年人的思想都框住了。讲不好听一点,家庭真的变成了牢笼,我们一辈子活得好委屈。

生活周刊:所以您主张要向西方文化学习面对孤独的态度。

蒋勋:是。在欧洲读书时我发现,他们从小就把孩子训练成独立的个体:你是我的小孩,但你的意见是独立的,我尊重你。意大利歌曲《我的太阳》,太阳叫Sole,唯一的意思。他们认为孤独是唯一,是与众不同,是做你自己,所以孤独是伟大的。这个观点我不仅在台湾讲,在大陆讲,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我都在讲,我写了那么多孤独的书,就是希望帮助那些在儒家训练系统中成长的孩子能独立思考。■